

伊利诺伊大学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

傅葆石

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展开的交流互动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从美国教育的理想主义与全球化憧憬到国际关系与种族主义。探究伊利诺伊大学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初构想和目标,以及迄今为止的实现情况,有助于揭示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中,曾经扮演了怎样矛盾而暧昧的特殊角色。

美国有一所高校名为“中国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新闻网站“高等教育界”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称为“中国大学伊利诺伊分校”。她之所以赋予其如此醒目的别号,是为了凸显这所州立旗舰大学中国留学生大规模增长的现状。新世纪以来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群体迅速膨胀,现已占据美国高校国际生源的最大份额,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正好同步见证了这一趋势。其本科生中的中国学生从 2000 年时的 37 名暴增为 2014 年的 2898 名;再加上 1973 名研究生,该校拥有近 5000 名中国学生,成为全美高等教育机构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Elizabeth Redden,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at Illinois,” Inside Higher Ed, 7 January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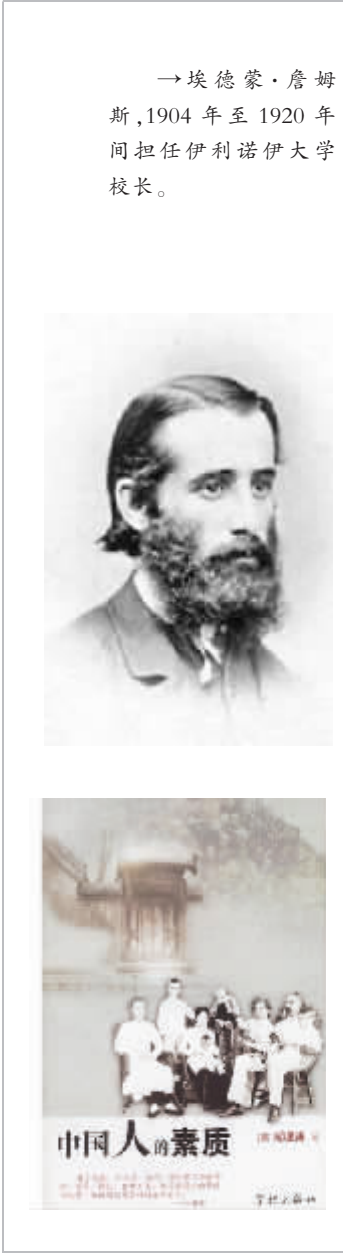
“中国大学伊利诺伊分校”的称号,除上述作者本意之外,还可以衍生出另一层含义,唤起谙熟于这所大学对华交流史的人们的某些悠久记忆。这段历史始于 1908 年到 1909 年间,当时全球的政治格局尚处于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掌控之下,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相对而言微不足道。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展开的交流互动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从美国教育的理想主义与全球化憧憬到国际关系与种族主义。本文致力于探究伊利诺伊大学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初构想和目标,以及迄今为止的实现情况。这段历史揭示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中,曾经扮演了怎样矛盾而暧昧的特殊角色。

1842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满清王朝的乱局导致中国此后陷入连串危机之中。不到半个世纪,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欧洲诸强蜂起瓜分中国,让曾经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华帝国”跌落谷底,沦为帝国主义

列强利益争夺的牺牲品。西方列强按照财富和权力重新制订国际规则,当此遽变之下,坚持传统价值以维系自身的文化属性,还是学习现代技术来提高国家的安全保障,这二者之间如何取舍平衡,成为中国思想先驱和知识精英们不断讨论的议题。这些思想交锋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早期的现代化追求终于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其标志便是张之洞在 1898 年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体用观”,既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又不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唯一性。虽然关于何为中国“本质”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辩题,但暂将其搁置不论,自从中国开始向西方重点学习机械、技术以及商业方面的先进知识,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 1899 年,随着美西战争告捷进而取得对菲律宾的统治权,美国跻身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第一梯队。只不过由于其外交和军事力量集中于拉丁美洲,它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正当诸强竞相争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John Hay, 1838—1905)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旨在确保所有国家在华享受平等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无论是否已经获得本国的势力范围(例如,日本在中国东北,英国在华中地区)。对当时尚未如英、日一般拥有势力范围的美国而言,获得国际社会对该政策的认可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帝国主义列强的默许(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因其“公认”的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则在美国的政客、传教士、商人和教师群体中激起与中国深入发展商贸及其他双边关系的强烈需求。正是基于这种国际背景,伊利诺伊大学开始在亚太地区建立关联并无形影响了中美关系。

20 世纪初,伊利诺伊大学在富于开创精神的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 1855—1925, 1904—1920 在



任)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国家级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初时,詹姆斯踌躇满志地来到厄巴纳—香槟市,力图将伊利诺伊大学建设成为跻身美国高等教育联盟、与哈佛大学并驾齐驱的公立大学。与此同时,他也希望通过教育来扩大美国在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詹姆斯校长对伊利诺伊大学的贡献,详见 Winston Solberg 著“President Edmund J. Jam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04—1920: Redeeming the Promise of the Morrill Land Grant Act,”(未出版手稿)]实际上,詹姆斯在担任校长仅仅两年之后,1906 年,就与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在华传教士和舆论领袖共同



←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 年来华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一生著述十余种,均与中国有关,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中,《中国人的素质》初版于 1894 年,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国民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先后被译为法、德、日等多国文字,影响深远。该书对百余年前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构成强烈震撼。

上书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82—1945),力主部分退还美国政府依据 1901 年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庚子赔款”,并用于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现代(美式)教育。

为什么偏偏是 1906 年呢?原本罗斯福政府的太平洋战略更重视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壮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只能叨陪末座。然而,爆发于 1905 年海内外华人圈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的亚洲政策。在此之前,经过二十余年排外情绪的酝酿,美国国会于 1882 年颁布了《排华法案》,不仅十年之内禁止中国劳工入境,更剥夺

了中国移民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甚至在 1904 年还将该法案无限期延长。尽管来自中国的学者、商人和官员在表面上得到豁免,但实际上一旦入境便难逃美方工作人员的持续侮辱与骚扰。受此影响,中国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组织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运动,以拒买美货的方式来宣泄国人对美国种族歧视政策和排华行径的愤慨。鉴于中方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强烈反感,罗斯福总统将这场反美运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信号,并开始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全新途径。(见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chapters 7 and 1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a, chapters 1—3)

就在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 1845—1932, 中文名“明恩溥”,其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到白宫敦促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的同时,埃德蒙·詹姆斯校长也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封与亚瑟·史密斯不谋而合的信函。这封信集中表达了“改造”中国的信念,被史密斯收录在其颇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今日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 1907)中,经常被人引用。教育在“门户开放”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正如埃德蒙·詹姆斯曾写到的,就在于教育的力量能掌控中国下一代人的心智和思维:

哪个国家舍得付出一定的成本来投入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教育事业,它必将获得道德、知识和商业领域内的巨大回报。……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如果美国能在 35 年前发现这一

(下转 12 版) ➡